

# 目 录

我在金子乡搞武装起义前后的情况·····	陈伯纯 ( 1 )
华莹山游击纵队简述·····	赵克家 ( 13 )
回忆华莹山武装起义前后合川地下党的 活动片断·····	胡少仁 ( 23 )
深切怀念袁昌绪同志·····	曹 健 ( 34 )
革命烈士左绍英生平点滴·····	左少琰 ( 40 )
合川农民武装反霸辑闻——三打葛家岩 ·····周雨田 罗中典 左少琰 罗四文 杨仁辅 郑家槐整理	( 42 )
我对黄慕颜在合川的片断回忆·····	卿步元 ( 48 )
合川新闻活动的点滴回忆·····	罗中典 ( 53 )
合川豫丰纱厂厂史简况 ( 注 ) ·····	姚学富 ( 59 )
合川桑蚕丝发展今昔·····	杨仁辅 ( 78 )
合川盐井铁厂发展前后情况简述 ·····徐绍稚 陈伯超	( 105 )

- 民生公司艰苦创业二三轶事……………段斧樵 段枕流(114)
- 存心堂药房兴衰纪略……………罗仲杰 杨仁辅(118)
- 合川县一九四一年献机运动始末  
……………唐唯目(123)
- 合川封建大把头周纯欽……………龙邦本  
李光倜 段斧樵补遗  
杨仁辅 倪化天删节整理(135)
- 合川评书名艺人——郭子全遯旭初  
……………周成文 马文清口述 张世昌整理(157)
- 合川担担丐……………龙邦本 (136)
- 合川县解放前后棋艺活动情况(20世纪40——80年代  
初)……………项辅民(168)

# 我在金子乡搞武装起义前后的情况

陈 伯 纯

一九四三年下半年，我在江北县悦来乡崇敬中学教书。地下党和我直接联系的刘传陆同志告诉我：上级指示，现在抗日战争吃紧，日本帝国主义对国民党继续诱降，蒋介石准备妥协投降，加紧反共反人民。我们要坚持抗战，坚持民主，坚持进步。为了配合前方抗战，打击蒋介石的反共政策，准备搞武装斗争。要我回合川金子乡把乡政权抓到手，作为武装斗争的一个据点。我曾于一九三九年调到中共南充中心县委党训班学习，阅读到一些党内文件，学过中国革命运动史。四一年在广安任党支部书记，读过《国家与革命》，懂得摧毁旧政权建立新政权的道理，有搞农运、搞武装斗争的思想准备。根据上级党的指示，我就决定回家乡去开展斗争。但由于中途不便离校，到放寒假后才离开崇敬。

我的家乡金子我在嘉陵江边，离合川县城七十华里，只通水路，不通公路，比较偏僻。我一直在外地读书和工作，在南充入党，本地人对我的政治情况一无所知，在他们的印象中，我只是个“地主大少爷”。

一九四四年初，我回到合川金子，先活动当了中心小学校长，下半年活动当乡长。当时我还是一个二十五岁的青年，能当上乡长吗？金子乡的地方势力较大的是陈、王两家。前任乡长是我一个叔伯哥哥，搞得声名狼籍。我在人们

的心目中，不打牌掷骰，不抽大烟，是个正派青年。高中读了两年就教高中，似乎还有点学问。陈家要抬人出来当乡长，~~会我其谁？~~再加上由重庆地下党员赵其文给他在合川县民政科当科长的同学陈娄中写了封信，交我拿去面见。起用谁当乡长，与民政科的关系很大。于是，县政府就任命我当了金子乡乡长。

两面政权么怎搞？我带着这问题到重庆去请示。四四年冬，传陆同志带我到红岩村八路军办事处，于江震同志接见了，对如何搞两面政权作了指示，看了一些敌后搞两面政权经验的秘密文件，向我传达了“隐蔽精悍，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十六字方针。并说我们的活动要极端秘密，今后有什么问题直接找他。我向江震同志要求给我派几名干部。一九四五年上半年，他就派南方局搞机要工作的老红军赵继同志到金子乡来准备作乡队附。

赵继同志化装成衣冠楚楚的商人，坐起滑竿到了金子乡。当时，我发现乡公所有一个叛徒，就没让赵继到乡公所，先住在我家。这个叛徒叫赵德明，一九四〇年和我在一个支部，一齐过过组织生活，以后撤退到成都，曾碰见过他，当时在綦江一个学校教书。听说我回乡当了乡长，写信给我，想到我这里来找个工作。我以朋友关系找他到乡公所来当司爷，安排他爱人在中心校教书。发现他精神状态不好，酗酒、打牌，意志消沉。我把这些情况向上级作了回报，上级指示要我审查一下。赵德明同我的私人关系还好，他曾打算把他的姨妹介绍给我，我在个人问题上当然有我的考虑（要找一个共产党员），只在表面上对他含糊敷衍。有一次我找他“谈心”，尽量把自己灰色起来，表示我早已失掉组织关系，“我这个大少爷，党还要我吗？”通过“谈

心”，他就把他自首叛变的经过，原原本本向我讲了。并出示了他登在特务机关刊物上的反共文章。这些情况还来不及向江震同志汇报，赵继同志就来了。当然不能让叛徒和他见面。我与赵继同志商量后，决定他立即回南方局，隔了两天，赵就带了这一新情况回重庆汇报去了。我又赶去重庆向上级请示处置办法，江震同志指示，先稳住他，然后把他弄走。我不能撤，仍坚守据点。以后我就借赵德明潦倒消沉，整天打牌喝酒，两口子经常吵架的机会，对他做了一些安慰工作。给他一些钱，劝他回家乡做点生意把家庭搞好，就动员他回岳池老家去了。到岳池后，上级又布置当地党组织派人监视他的活动。

一九四五年下半年，南方局另派了刘石泉同志到乡公所当司爷，后来又派张伦到中心校教书，地下党是单线联系，张不知道我的身份。我虽然没当中心校长了，但安排教师的大权仍由我掌握着，中心校长是我的亲戚王云泽，完全听从于我。四六年上半年王不愿当校长，参议员陈资生（此人是青年党）弄了一个人来当校长，由于我不同意合作，搞了半年就走了，仍由王云泽当校长。

我和刘石泉分工，我抓上层，搞统战工作；他作基层群众工作，发动群众，发展党的组织。对群众工作我不直接插手，以免暴露身份。

金子乡陈、王二家的势力很大，我通过各种关系把这两家有影响的人物都控制在我手中。在陈家方面，我有一个叔父陈玉田是国民党区分部书记，他不大管事，写得一手好字。我就与他往来，送他书法字画，他称赞我“老贤侄不错”，对我很信任。这样一来，国民党县党部来的文件通通由我拆阅。另一个叔父陈恩斋副乡长，是个破落地主，袍哥

大爷，讲究义气；还有个哥哥陈缉熙，曾在刘湘部下当过少校军官，以后落魄回乡，我同他们的关系也搞得不错。王家方面有个王绍文，大地主，乡民代表主席，同三教九流都合得来，为人正派，喜欢看书，有新思想。我就介绍一些书给他看，也给他《新华日报》看，逐步影响他。副乡长王少怀，曾在地方军阀中当过连长，是个落魄的袍哥大爷，也向他作工作。至于中、小，地主对我当乡长很放心，认为我不贪污、不打牌、不抽大烟，不会整他们。

我在县政府也不放过任何机会进行活动。在城里安了耳目，每次进城、开会，给我的同学、科员送点东西，有事情便给我通气，可谓消息灵通。比如有个曾作区长，名叫王其相的破落大爷，住在县城，以招赌为业，县里的重要人物都到他那里去打牌。我同他拉上了关系，对金子乡有什么风言风语，他就给我捎信。有一次，县长打电话要我马上进城去，心想哪河水发了？作了各方面的分析，为慎重起见，我带上手枪和便衣，晚上溜进城，先通过同我有关系的科员打听消息，知道没事，然后第二天才大摇大摆去见县长。原来是因为法国教士在金子乡教堂办私塾，教自己编的课本，我们要他教我们的课本，把他的课本没收了，国民党当局以为得罪了“同盟”国，不得了！要我善作处理。

还有一些上层关系，那是虚张声势，做给别人看的。比如有个詹正圣，四川省政府巡视员，与国民党元老于佑任的关系密切，他以监察院西南监察室副所长的身份到合川巡视。我知道后，就以宴请老师的名义在城里大宴宾客，请县长、书记长、参议长等赴宴。又一次，我的一个亲戚陈启东，是省府特派员，到了合川，我又在城里大宴宾客。县党部书记长是我哥哥的老姨，县里的一些同学有的是科长，有

的是军官，有的是特务，我也同他们相混。在人们的印象中，认为我这个人“神通广大”。由于我经常同上层人士来往，我的信件很多，有警察局来的，有师管区来的，真是“往来无白丁”啊！在乡下，我大搞“掉把”，结拜弟兄，广交朋友。

就这样，我利用这些关系作掩护，坚持“长期埋伏”的方针，整整当了四年乡长，直到一九四七年冬天一直未暴露。

在发动群众方面，刘石泉和张伦利用职业作掩护，分别在农民和知识分子中作工作。他们在乡场上办起了图书室，在保上办起了农民夜校，教育启发群众。同时尽可能关心群众疾苦。我爱人张岚星是学医的，在乡场上免费替群众看病，“送看左手”，农民说她是活“观音”。我们利用合法形式搞“生期会”，“姐妹会”，秘密组织“三抗队”（抗丁、抗粮、抗捐）半公开建立农协会，开展农民运动。到一九四六年、四七年，全乡十四个保普遍建立了农协会，并发展到附近的十几个乡，包括武胜，岳池地区。成千上万的农民参加了农民协会，同时掌握了乡保自卫武装。在发动群众过程中，分别在农民和教师中发展了党员，建立了党的组织。

开始发展党组织是由刘石泉、张伦等同志出面，我仍保持灰色面貌，有时只参加研究。我们对发展党员和农会骨干都很慎重。如发展周树植、张笃、谢志光等同志入党都做好几年的工作。

我这个乡长怎么当。既不能做坏事，又要应付伪政府。因此，对派丁派粮只好采取拖的办法。由于欠丁欠粮太多，县政府大为不满，专门派了一个姓张的指导员、来检查我的

工作。这位指导员，一到金子就气势汹汹地指责我工作不力，有意渎职，把我乡长的职撤了，召开乡民大会另选乡长。殊不知乡民代表都听我的，我在乡民代表中通通气，选举结果，我得全票。他不满意，下令重选。再选一次，又是全票。把我没法。而我表面上对他酒肉相待。打牌时，送他一叠钞票做本钱。临走用滑竿相送，他只得夹起尾巴灰溜溜地走了。

一九四七年下半年，开始建立秘密武工队。冬天，准备拉队伍。我到岳池、武胜活动搞枪支。腊月二十八日回来，刘石泉对我说：“上级告诉我，说我们暴露了，要我们紧急撤退。”我们在撤退前对工作作了交代部署：继任乡长由陈辑熙担任，大刘司爷（刘石泉）走后，工作由小刘司爷（刘乐忠）接替，政权仍掌握在我们手里。我还在年关前若无其事地赶了最后一场，然后神不知鬼不觉地转移到了广安，刘石泉则到乡下去隐蔽起来。

后来听说，四八年冬，国民党警察中队到那里去清乡。这次暴露是由于我们在工作上有些不够策略，如劫持地主武装、搞枪；抓地主的小孩做人质，还枪毙一个反动人物。县参议员陈资生向县长告密，把我列上了逮捕的黑名单。由于群众的基础较好，组织上没遭到破坏。警察中队到金子清乡，胡乱抓捕，吊打了一些人就走了。后来，伪县长李少雄又亲自来，还到我家清查，也无结果。只得从监狱中押了两个土匪到金子沱来枪毙，以震慑群众了之。

受我们影响的上层人士王绍文，这段时间有什么情况还悄悄跑来告诉我。以后，他也受到嫌疑，曾两次被捕，但都未暴露我们。国民党政府软硬兼施，要他加入国民党，他也不答应。由于他是大地主，还有些势力，终于用黄谷、金条

活动保释了出来。解放后，作为统战对象，安排他先后在县人民政府担任科长和副县长。

我在广安观音阁参加起义是一九四八年七月五日。先是我离开金子后就到了罗渡，在伍俊儒家住了几天。广安派余庭建同志来接我，余在广安县是做上层人士盛克纯的统战工作的。他把我接到广安后交给谈剑啸，谈就把我送到观音阁。我化名陈仲良，以教书为掩护，在那里任特支书记，搞农运工作和地下武功队，为起义作准备。不久，在大竹武装起义失利后，胡正新就带着陈尧楷、徐向应、徐英培同志来到观音阁，我把他们安排在山下农民的家里。胡正新带来了一支武功队，有十几条枪。一九四八年夏，王璞同志（中共川东临委书记）来到广安（当时重庆市委书记刘定国已叛变）通知我进城汇报工作。这是我第一次会见王璞同志。我与王璞同志一起去馆子吃了饭往花桥方向走，一边走一边向他汇报党组织和群众工作，以及掌握的武装等情况。他指示我，叫我们准备武装起义，把队伍拖出来。他还将金子沱的情况给我讲了，说那里还在积极准备武装起义，叫我在观音阁搞了起义后赶回金子搞。从此以后，我就加紧进行武装起义的准备工作。一九四八年七月，上川东地委委员骆安庆已被捕叛变，情况就十分紧急了。于是我就剃光了头，化装成农民，离开学校到观音阁山上活动去了，那里有农民群众组织，我便整天跟着武功队。不久广安绿市出了问题，刘隆华同志转移到我们这里与曾霖同志他们被安排在农民家里。那段时间我到处活动。起义准备好后，一九四八年农历七月五日，上级通知我去开会，陈尧楷、贺天测护送我去指定地点参加会议。出席这次会议的有杨玉枢、谈剑啸等。杨翼琴同志传达了王璞同志的指示，安排了广安暴动的时间。确定广安这支

队伍为西南民主联军川东游击纵队（也叫华莹山游击纵队）第五支队。司令员杨玉枢、政委刘隆华（有说是谈剑啸）。支队下设两个总队。代市为一总队，谈剑啸同志兼总队长，温静涛同志任总队政委；观音阁为二总队，邓志久任总队长，陈伯纯任政委，张德沛任总队参谋长。当时杨翼勤同志还传达了王璞同志的指示，叫我在广安交代一下情况和任务后立即回合川参加起义。但谈剑啸、杨玉枢叫我把队伍拉出去后再走。队伍拉出去后，我们这支总队第一仗是打观音阁。农历七月初八拂晓打观音阁乡公所时被敌人发现了，队伍便退下来拉上山准备与谈剑啸那支总队汇合。队伍在山上走了几天几夜，没有找着谈剑啸那支总队。一天早晨，队伍到了桂花场附近一山个上，正准备吃早饭，被敌人的保安团，警察队伍包围了，杨玉枢指挥大家冲出去后，队伍被冲散了，我和杨玉枢、胡正新、肖玉芳（女）刘隆华（女）五个人与队伍失掉了联系。我们五人除胡正新有一支手枪外，其余都是赤手空拳。于是只好在半山腰一个草丛中隐蔽起来准备夜晚才活动。国民党的队伍和保甲武装都在搜山。我们隐蔽时被当地的一个保长张世敏带的队伍发现了，而我们没有发现他们，后被他们包围抓住了。他们将我们捆起来搜身，凑巧在我们身上搜出了一封还来不及送出去的书信，此信恰好是我部参谋长张德沛写给他的侄儿张世敏的，信上的意思是动员张世敏把他那十几支枪拖出来参加我们的队伍。张世敏将书一看就犹豫了，便不将我们送乡公所，而送到一个么店子的大碉堡里关起。刘隆华和我就给他做思想工作。到了半夜他就把我们放了，并把我们隐藏在一个山洞里，派人给我们送饭。我们几个人商量后，怕夜长梦多，就派胡正新去找当地党的二线组织。肖玉芳腿被摔坏了，又是本地

人，她就送回家去了。一个叫何建福的党员把我们四人接到了他的家里。在他家正吃饭时，敌人又清乡来了，便把我们四人藏在仓里。胡正新因是本地人就叫他走了。剩下我们三人，后来被安插在农民家里住。因为找不到队伍了，我想到王璞同志指示过叫我赶回合川，我便决定离开广安回到金子沱去。

第二天一早，我和胡正新、刘隆华三人便向广安县城方向走了，途中我们保持了一定的距离，刘隆华走在后，后因途中下大雨，我便在路边一个么店子烤衣服，结果刘隆华与我们走失了，经过回头去找也没找到。

我们到广安后不便住旅馆，当晚就到我大舅子那里，他在广安作邮政局长。我和胡正新在他家住了一晚，他给了我们一些钱。我们又到我外婆家。了解了一下情况又转到小沔溪我姨妈家。在那里派了一个农民去告诉我母亲，通过我母亲去告诉当地党组。第二天我母亲就到我姨妈家，告诉我说组织上有人来接我。住了一天，党组织派张笃（内江人，西南联大学生，在金子教书时发展的党员）来接我了。他说：

“王璞同志在合川金子等你，明天他要见你。”第二天我便回到家里。见到了王璞同志我便汇报了广安观音阁起义的情况。这时罗永晖在起草四支队的起义布告，王璞同志在修改。起义军命名为“西南民主联军川东游击纵队第四支队。”王璞叫我任司令员，他任政委。还叫刘乐中同志刻了一枚大印。

一九四八年八月二十五日（农历七月二十一日）起义军派张伦、秦鼎带领百余人去武胜打下真静乡后便转攻金子沱。打金子只是一个形式，为了掩敌人耳目。因为乡公所的乡长陈缙熙是我们的统战对象，乡公所的文书，乡丁早已是

我们共产党的太了。在会剿中队伍时有几万人，因大多数  
人没有枪支，便动员没有枪的人都留了下来。攻打金子后，  
队伍便开往金子二郎庙宿营。八月二十六日（农历七月廿二  
日）起义军在武胜真静寨花园与武胜警察中队，乡保丁队  
伍打了一仗便到武胜石盘大龙山与王屏藩同志的队伍会师  
了。以后和一些乡公所的多丁打了一下，没有什么大的战  
斗。八月二十九日在董花岭战斗中，南充伪警察局长被当场  
击毙。九月一日队伍到了三元寨，同蔡依渠带领的部份武装  
人员汇合，并将三支队伍并为一支队伍，与南充、岳池、武  
胜、广安等县的保安团、自卫队，伪乡丁、内二警的部队共  
约三千余人，进行了三天的激烈战斗，九月三日转移撤退。  
第二天发觉队伍在转移时分散成了两截。前队由王璞，蔡依  
渠，陈伯纯、王屏藩等同志带领，沿途打了一些小遭遇战，  
于九月七日转移到武胜石盘木瓜寨。在寨上研究对策时，罗  
又新同志手枪走火，王璞同志不幸中弹牺牲。晚上我们便突  
围出去。王屏藩等一部份同志就地隐蔽，我与易难，刘瀛洲  
等二十多名外地同志则由王屏藩安排在附近的刘家院子隐蔽  
起来，然后分散转移。第二天拂晓，敌人又来围攻我们，我  
们在突围中队伍被冲散了。

突围出来后，只剩下我一个人了，我便转移到武胜沿口  
响水滩（现武胜师范校），隐蔽在一个水磨下面藏了一夜，  
我的手枪撞针已打断了。待黄昏时刻出来，真凑巧，碰上我  
原在江北悦来场重庆中学教过的一个女学生唐克毅。她正牵  
着孩子在田坎边散步，看见我便说：“唉呀！陈老师，是你  
呀！我们正在谈你哟！到处都在抓你，快到我家里去！”她  
便引我到她家住了一晚，搨一身泥巴衣服全换了，草鞋也换  
了。第二天一早跟随卖小猪的童娃去游日，准备到重庆。

到沿口，看见满街都是国民党的部队。对船只检查甚严，陆路又不通，怎么办？我就从河边上街进厕所蹲着想办法。最后还是决定赶船。便化装成船伕子，屁股插一根烟棒，走到河边，发现一只检查过的粮船正在起航。我便趁机跳上船去，随机招呼一声：“兄弟伙，搭个梢！”船老板便答应了。我在船仓中用草帽遮着脸，离开沿口到了武胜县城中心镇，船靠岸受检查，那些兵也未发现我。船顺江到了金子沱，伪军又在岸上喊停船检查，我可有点慌了。我原是金子的乡长，谁不认得我？！船老板似乎有点心照不宣，便站在船上回答说：“我们这是米船，在武胜是检查过的！”不管那一套就顺流而下。到合川鸭嘴靠岸，晚上我又不能住栈房，便在河边徘徊，待伪军检查过了又上船，并对船老板说：“栈房臭虫咬死人，船上蚊子我不怕，就怕臭虫咬。”便在船上宿了一晚。第二天随船到了瓷器口，便上岸搭车进了重庆城。

南方局要撤走时，于江震同志给我留了一个关系，他对我说：万一南方局撤走了，你去找刘定国，他是重庆市委书记，但刘定国此时已被捕叛变，大夏银行刘二姐那个地下交通站不能去了，因刘定国知道。我便设法通过我的表妹去找我的爱人，恰好我爱人张岚星那时已由铜梁到了重庆。当天把我送到重庆市邮局办公室住宿一晚，次日便将我送至曾家岩我三哥家隐蔽起来。后又转移到铜梁去找党组织。

我参加广安观音阁起义和在合川领导金子沱起义失败后，我被列入悬赏捉拿的要犯。我化装转移到铜梁那天正逢场期，被我过去的同学，县自卫队大队一个连长认出，到县府密报。说我率领游击队进城来了。这一消息被我打入国民党铜梁县党部特委会的阮少成同志获悉，立即把消息报告给

中共铜梁中心县委。这时川东特委书记肖泽宽同志正在铜梁巡视工作，就和中心县委游文俊等同志一起研究营救办法。游文俊的公开职业是县银行副经理，认为伪军出动要发军饷，必然到县银行提款，游借口拒付，以拖延时间。然后估计我可能往西到斑竹乡小学张岚星同志处落脚，便布置地下党员伪装过往行人到西门三岔路口给追捕的伪军往相反方向指路。果然不久，一队伪军出动到三岔路口，问一个在么店子门前的人：“你们看见一个乘滑竿的人往哪儿走了？”“看见的，往北朝安居方向走了。”我们的人回答。于是，伪军立即朝安居追去。在安居搜捕了两天，不见我的踪影。特委会分析情况时，我们打入特委会的同志又顺势说：“可能从安居回合川去了。”安居与合川仅一江之隔，这一分析也合情合理。而“要犯”既然离开铜梁的辖区，上峰也就不会追究他们的责任了，便此作罢。

与此同时，铜梁中心县委又马上派杨德敬同志到斑竹场，接我转移到东山蒲吕乡李湘石同志家里，在那里会见了肖泽宽同志。

不久，我就转移到川南去了。

（党史资料办公室供稿）

（一九八二年十二月十五日）

## 华莹山游击纵队简述

赵克家

四七年上半年，中共十八集团军驻渝办事处（即红岩村周总理的住所）和新华日报被迫撤离后，地下党组织曾中断了一段时间的联系。市委筹办了地下刊物《挺进报》，发刊不久，即被敌伪侦获破坏，因此，市委不得不撤离一批重庆市的同志下乡搞农运。在同一时期，各地地下组织又不断暴露。在川东合川，首先是金子沱的暴露。陈伯纯同志，是党组织派他回金子沱搞敌伪政权并掌握敌乡政武装的。四八年春初，被合川伪县政府发觉，伪县长李少雄以兵役故出签（即逮捕令）拘捕，签曰：“查金子沱乡长陈伯纯，办兵不力，应予拘捕。”当被我党知晓，即派通讯先敌伪军警而至，俟敌伪军警至时，伯纯同志已率武装隐蔽。此后，川北岳池界罗彬同志亦暴露。岳池伪县警出动搜捕罗彬家。伪军警至时，罗尚未出走。罗家大院有围墙，伪军警围捕于外，不果逃。幸四邻群众基础好，罗藏于秘室内，佯谓外出未归，所有枪弹均未受损失。继后，罗渡中学杨奚琴同志暴露，走马岭张蜀俊同志亦相继暴露，因此不得不起义。

重庆市内同志遣调农村，增大了农运工作量，农村党组愈难隐蔽，因此促成武装起义。这是工作与客观形势的促成。本来早在抗日时期，党组织即先有农运组织从事农运，不过当时居于隐蔽期，直至党被迫撤离重庆后，农村工作超过了隐蔽的饱和状态，组织相继暴露。坐以待毙，不如铤而

走险，因此，组织决定武装起义。

### 一、当时对武装起义的估计和准备

据组织调查研究，了解当时四川无部队，正规伪军已全部调出川外，在四川的，仅罗广文的三个新编师，全部为新兵。武器虽好，有轻重机枪，八二迫击炮，但排连长均有开小差的。另有伪四川省保安团一个团的伪军，散居各专区及省垣，王元辉任保安团长兼司令。仅以这点兵力，各县住一个排都不足。省外邻界，云南有宋希濂的二十多万人，兼顾贵州与广西。陕西、甘肃界有胡宗南的部队三十多万人，用以围困我陕北根据地延安，因此四川军事压力不大。另外，重庆有伪内二警（即伪内政部第二警察中队）二个中队驻重庆市，维持重庆市治安，如我们各处均有武装起义，敌伪政权很难分兵把关，很可能建成华莹山游击区。

华莹山游击队纵队的基础是什么时候打下的呢？早在抗日战争年代，我们党就在江北、邻水、渠县、广安、岳池、武胜、合川布置了武装斗争的组织，但敌人对我们施加的压力极大。四〇年（那时我还在广安读书，据组织上传达）张群作四川省主席以后，在春初即调动了三个师（胡宗南部）来川，驻合川的是七十五师，驻广安的是八十八师，驻邻水一个师。还有驻岳池的新九师（师的番号是我现在的回忆，当时学校正为屠宰猪税闹学潮）。对广安的郑启和（曾作过杨森的师长，后弃职）以他抗丁抗粮的罪名进行清剿。在这之前，暗杀了他的秘书钟子范（地下党员）。清剿之后，逮捕了他的侄儿郑××。后来在渣滓洞牺牲。以后特务头子（中统组长）王元枢作邻水县长打鲍平章，作广安县县长打盛

克纯，广安、邻水的地下组织都先后受到很大的摧残。渠县在左右县的敌伪政权威胁下，简直不敢动，也动不起来。江北离重庆太近，易被敌伪发觉。只有岳池、武胜、合川群众基础较好，因此应以三县为起点，以此带动邻近各县。华莹山游击纵队，就是以华莹山邻近各县，包括合川、江北、武胜、岳池、广安、邻水、渠县等县的党组织地下武装所组成。

当时是谁领导的呢？当时是双重领导，省委领导，重庆市委也领导。起义前夕，一九四八年春，西南局还派了一位新四军的老干部，身经百战，遍体鳞伤的王璞同志（当时叫王伏芝）协助武装起义，（据查证，王璞是当时临工委书记，是直接领导武装起义的负责人。编者。）并由组织送来了发报机，派来了秘号报务员。不幸王璞同志在手枪走火的灾难下牺牲了。

一谈到武装起义，就是要用武装（用暴力）去夺取敌伪政权，用打仗的方式摧毁敌伪政权，建立自己的政权。打仗是要有武器弹药的。我们的武装那儿来的呢？我们的武装怎样组成的呢？一个来自敌伪武装，即合法武装，以敌伪武装装备我们自己，使之合法化。如我们党组织派去敌伪政权作军政地方首领乡长、队长等，可以公开的养乡丁、警丁，使之成为合法武装。一个是私人武装。即当时以地主面目组织的自卫武装及匪运等，即非法武装，为敌伪政权所否认的武装。我们为什么要搞匪运呢？匪运不搞，它是我们的敌对力量、它与土豪恶霸有勾结，于我们不利，搞了匪运，它会变成我们自己的力量，有很好的战斗力。土匪大半是无产者，属流氓无产阶级，有的是田无耕、地无块，难为生计的穷苦农民被迫去作土匪的。搞匪运属于统战工作的一部份，是